

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述

方 祖 猷

万斯同主编明史，史称其稿为王鸿绪所攘窃，八十年代，史学界曾对此进行探讨，并涉及对其史学思想的评价。然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万氏亲笔的《明史稿》手稿，故各种意见，皆未能得出最终结论。笔者曾有幸查阅了今藏宁波市天一阁的《明史稿》（一名《明史列传稿》），考定半为万氏亲笔，半经万氏修改。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未能对此稿本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仅为初考，希冀能抛砖引玉，请史学界同仁多加指正。

万氏手稿的流散和存亡

万斯同在明史馆无总编之名而有总编之实，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是否仅对各史官的呈稿予以增损而自己一无所撰呢？由于万氏在京逝世时，其所藏书籍及各种手稿，都被弟子钱名世所窃，而其所窃，又不知所终，使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造成了困难。

幸而万斯同在京修史期间，曾两次归里探亲，他曾把自己撰稿的一部分携藏于家。雍正间，其子万世标著《明史原稿流散目录》，开列了“先君子明史原稿家间所藏者”的目录。除称《名臣列传》有陈诰、许汝霖、蔡瞻岷三家抄本外，又说：“其原稿皆在俨斋（王鸿绪）先生家。至《横云山人集》所刻史稿止得十分之一，皆系钱亮工（即钱名世）改本。如后妃、诸王、外国诸传不涉忌讳者又仍先君原本。熊中堂（熊赐履）进呈之史，又倩人改过，另是一册进呈”（《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墓·明史原稿流散目录》）。

万世标所说值得注意的有四点：一，既说原稿家中有，又说皆在王鸿绪家，似有矛盾，然而细玩文意，在家原稿为斯同手迹的“原本”，而王氏所藏为钱名世“改本”，二，王鸿绪《明史稿》只不过取万氏原稿的十分之一；三，熊赐履于康熙四十一年进呈的史稿，是钱亮工改本中的改本；四，万氏《明史稿》又有钞本。

因此万氏《明史稿》在其身后的存在，就十分复杂了：既有万氏“原本”；又有他人所作经万氏修改的；有万氏口述钱名世笔录本（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万斯同修明史》）；又有钱名世的“改本”；有熊赐履请人改过的史稿；又有王鸿绪的改稿；又有钞本。而钞本之中，经今人考证，有史馆抄本，有私人抄本；有抄于史馆未完成之稿，又有抄于已完成者，更有辗转互抄的。如此种种，致使现在所存的《明史》各种本子，详略分合，各不相同，谁为抄本，谁为稿本，也很难断定。

至于各种本子流散的情况，除万世标所说的外，方苞在康熙五十七年所作的《万季野墓表》中说，存于王鸿绪的本子，“淮阴刘永祯录之过半而未全”。这样，除万世标所说的《名臣列传》有陈实斋（陈诰）、许时庵（许汝霖）、蔡瞻岷（安徽桐城人）抄本外，增加了刘永祯抄本。至于原稿，更引人注目，光绪三十三年萧穆在《敬孚类稿》中说：“又以前闻万季野《明史稿》尚在故镇江府知府王可庄太守家”，而王可庄（即王仁堪）是从厂肆间购得的（见黄潜《花随人圣庵摭

忆·王仁堪与张之洞书》)。

在此之后,值得注意的是冯贞群的说法。1924年他有信给陈训慈先生,信中说:“《明史稿》钞本尚有存者,多属胥录本,非其手稿(原注:吴兴刘氏嘉业堂藏有刊传稿,篋中有《地理志》稿,校横云史稿,无甚异同。)惟松江图书馆馆长雷君彦藏有残本四册,云得自横云后人(原注:本有八册,半赠缪艺风矣。艺风云亡,藏书流出,不知归谁氏?)有五色笔修改,句勒涂抹,损益甚众。贞群于曩年客游松江,曾寓目焉,大体本之《实录》,兼采野史。缪艺风云,季野原稿藏镇江府王可庄家,……访之闽中,其稿或可得也。”(引自《万斯同年谱》六《谱后》,香港中文大学1991年版)

后来,冯贞群致书黄云眉,也述及这一史稿。但这一部存于雷君彦、缪艺风处各四册的史稿,既有五人修改,自不属于万氏自撰史稿。冯贞群在与陈训慈信中说他藏有万斯同各类书稿,其中有《历代河渠考》,并说:“《四库》作《明史河渠考》,十二卷。采《明实录》中涉河渠者,分年编次,颇伤冗杂,与《横云史稿》详略殊悬。”可知所谓“历代”,指有明的各代。此书当为万氏备修明史所用的。

自雍正年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屡经沧桑,万世标所藏万氏原稿及冯贞群所藏《历代河渠考》,现又不知流散何处?也可能随着时间之流逝而在世上消失了。

本世纪三十年代,谢国桢作《晚明史籍考》,六十年代,扩而成《增订晚明史籍考》,书中并未提到任何一种万斯同亲笔的《明史稿》,仅提及与万氏有关的三种抄本,即现藏北京图书馆的《明史》四百十六卷本和《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本以及海盐朱氏所藏《明史稿列传》(残本,存八册)本。在《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本书目下面,引朱希祖《万斯同明史稿跋》中一段话:“北平图书馆购得福建王仁堪可庄所藏万季野先生《明史稿》三百十三卷,除去钞配《明史》三十卷,实存二百八十三卷。……其为乾隆时传钞之本,而非原本无疑。”这样,萧穆在《敬孚类稿》中所说的《明史稿》原稿,其实也是钞本,而非稿本。

谢国桢在引朱希祖话后,在按语中说:“近见萧山朱鄮卿氏藏旧钞本《明史稿》八册,为永乐以迄天启、崇祯时之列传,与《明史》颇有出入。每卷有‘季野’朱文印,文中间有涂改,当为季野手稿。”谢氏所说前后矛盾,既说为“旧钞本”,又说为“手稿”。后来,他在《江浙访书记》中则改为:“实则此书系内阁大库或明史馆递次修明史的底本,若说是真万季野之稿本,未敢断定。”(《江浙访书记·宁波天一阁文物保存所藏书明史稿》)。

由此看来,万斯同《明史稿》原本,似乎真的在世上消失了。

天一阁藏《明史稿》考证

谢国桢所提朱鄮卿藏的《明史稿》共十二册,而非八册。其中一册封面有“□□季野明史稿原本”字。各册首页多有“季野”朱文长方小印。有一册后面有朱鄮卿的《跋》,略述此稿的由来:“一九三四年周氏携至金陵,谓河南革命遗族亟需抚恤,其值高悬,无人问鼎。沙村书来,称楚弓楚得,当归甬上。余非鄮人,走告伏跗、蜗寄,则皆固拒。函电交驰,不绝于道。属有天幸,归于余篋,与黄氏《明文案》稿本为侣,同为句章双璧。偶有夺佚,终不失为明史著述第一善本。朱墨斑烂,赤炼蛇、火枣儿糕更番迭出,难以枚举。”

朱鄮卿即宁波当代著名藏书家朱鼎煦,其藏书楼称“别宥斋”,沙村即著名书法家、原杭州西泠印社社长沙孟海;伏跗即宁波著名学者、藏书家冯贞群,其藏书楼称“伏跗室”;蜗寄即

宁波著名藏书家孙家淮，其藏书楼称“蜗庐”。

关于此稿本的来龙去脉，沙孟海有《万季野明史稿初步鉴定意见》（后经修改，以《万季野明史稿题记》为名，载于《宁波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寄陈训慈与方祖猷，文中说：“稿本原藏河南人周维屏家。一九三二年备员教育部，周来南京，自言是辛亥革命老同志遗族。年前呈送此稿到行政院，申请政府购藏，以示抚恤。行政院发交教育部处理。当时南京未成立中央图书馆，物主索值又昂，因而悬案未结。余提看原件，审为名迹。……余为此事专谒柳翼谋（即柳诒征）先生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征询其意见。柳先生早曾过目，极口称赏，并谓已录副存馆，其中若干篇且付馆刊发表。余提问收购价格，柳先生说，公家收购，可酬一千五百元，私人收购，一千元足矣。余参照此意，与周、朱双方联系，终以九百元成交。此稿遂归甬上朱氏别有斋。楚弓楚得，亦快事也。”

此稿有一册卷首有今人吴泽、葛晓、陈宁士、李晋华、张宗祥的题词。张宗祥从笔迹断定：“此稿字体含章草味，万氏早期字学石斋（黄道周），当为亲笔。”李晋华则说：“原钞墨迹甚旧，朱笔窜改之处甚多，闻为季野哲嗣所缮，经季野删润者，是季野史稿又见一本矣，惜不得北平图书馆本对勘，无从知其异同。”

一九三一年，著名史学家柳诒征对此稿予以考证，作《明史稿校录》一文，他说：“郑君鹤声持视教育部发阅中州某君贻呈之万季野《明史稿》十二册，属余定其然否。余熟视之，信为康熙中明史馆纂修诸公手笔，不敢遽断为万先生书。书虽不完，朱墨烂然，绳削增损，具见史材之璞（见《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四年刊》）”。柳先生在后面又说：“此稿不问其为万先生原本，抑他人分任经万先生润色者”，其立论相当慎重。

柳诒征否定此稿为万氏亲笔，是从反驳此稿的签题和跋印入手的。认定此稿为万氏手稿，其理由有五点：第一，有一册有“□□野明史稿原本”的题签；第二，这一册的封面有一段题记：“此乃从稿本中誊清者，吾父又仔细看过，抄时当以稿本编次为据，不过汇订成帙耳，无次序也。”下未具名，然有无名氏在后题：“此页系季野先生长子万焜所书，原在第十册篇首，特移此处，以见后两册有誊清者，多焜手迹与门下书，至朱笔修改，均季野先生手笔也。”第三，此册还有翁方纲述万斯同修史和遗著情况《宝苏室小草》七古一首，后有翁氏《跋》文：“乾隆己卯秋，余典江西省试，闻南城喻子心筠云，有人持万季野《明史稿》十册易米。次日，急遣人往访，其人已去南昌矣。因叹交臂之失。其明年春，予旋役京师，与丁小正太史、王述庵侍郎、张瘦同巷人皆居同巷，朝夕相过从。一日，于小正案头获睹此书。小正云，是友人托售者。余急摩三月俸得之。……明日出此示卢弓父学士，并告以贱价得之。……四月十二日漏下三鼓，宝苏室记并题。”第四，其后又有丁小正《跋》：“万季野先生学识渊深，著作宏富，为明季大儒，士林师仰，修定明史，功德甚伟。其自著《明史稿》原□，……其稿本向由万之子孙秘藏，不轻视人。今由其亲张孝廉携带来京，托余觅识家珍藏，以冀永保。覃溪（翁方纲）阁学，一见欢欣，急出巨金购之。……后卢予父欲具倍价，终未能得，故不胜其妒也。用识数语，以记鸿爪。乾隆庚辰清和月小正恭记。”第五：各册首页多有季野朱文长方小印，也有印于传目具名空处的，有倒印的。

对于这五大理由，柳诒征反驳说：“余意签题及小印胥可伪为。万焜所题既未署名，何从知其确为季野之子所书？此五事，中确可依据者，止覃溪一诗，见《复初斋集·宝苏室小草四》，然《宝苏室小草》注明年月，此诗实作于乾隆丙申九月，而此书之《跋》，则称是己卯之明年四月。丁小正亦署庚辰清和月，其不合一；乾隆庚辰年，卢抱经（即卢弓父）不在北京，且未

为学士；王述庵虽在北京，亦未为侍郎。……其不合二；翁诗有云：‘体例依然无论赞’，盖万书无论赞，王稿亦无论赞，而此稿王宪、金献民等传后有论一篇：‘……’，其不合三。若笔迹之不似翁书，印章亦似仿造，丁小正《跋》语之浅俚，且误以卢弓父为卢予父，则尤一望而知其伪矣。”柳诒征还指出，这十二册中，有一册确有主名，即书有“徐潮具稿，监生叶沅录”的一册。柳氏说：“既明署徐潮撰，恶得目为万书！”并指出：“又一册朱笔眉批，显见批者与撰者为两人之语气”，举其中《陈琳》、《周世选》和《王廷瞻》三传为例予以说明。

柳诒征考证《题》、《跋》之伪，十分有力。柳氏弟子陈训慈在其所著《幼师从游脞记》一文的《幼师对明史修订一部分之意见》中，称誉其师的考证：“查校推断，抽茧剥蕉，胜似老吏断狱，此抄稿本之非万氏《明史》早年未定稿遂决。”（《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别有斋主人朱郑卿似乎看过柳诒征的文章，因此他在觅良工精装后，把所谓“万焜所书”的无名氏题记及翁方纲、丁小正题跋全都去掉，只字不留，致使后来吴泽、李晋华、张宗祥、谢国桢等人均未见此类似作。

柳诒征廓清书贾加于此稿的迷雾，为进一步考证此稿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万斯同仅有二子，长子名世楷，早卒，见于万斯大《学礼质疑》卷二《宗法八·宁波谱》；次子名世标，字子建，见于《濠梁万氏宗谱》卷九《世传八》，皆“世”字排行，从未有所谓“万焜”其人，故此稿无名氏的题记确系伪造。然而柳诒征的考证在逻辑上有不足之处，从反驳其论据，不足以推出论题错误的必然，从此稿题记和跋的伪，并不能必然推出此稿一定也假。因为书贾为了求利，出于无知，也可能在真品上伪造标志，结果弄巧成拙。柳氏自己也说：“翁、丁跋虽伪，无损于万书之为真也。”此稿的“徐潮具稿”一册固然不是万斯同所作，陈琳等传批者与撰者也确为两人语气，显非万氏所撰。然而，以少数诸传为例，不能得出其他各传也非他所作的结论。在不完全归纳推理中，它的结论是或然的，可能对，也可能错。此外，这些朱批究竟出自谁手？如出自万斯同，那末此稿的价值显然大大增加。为此，必须对此稿进一步考证。

首先，考证的关键所在，在于史稿中的字迹与万氏的亲笔是否一致？由此，则真伪立见。细阅此稿，显有两种笔迹：一种为正楷誉钞本，一种为草体稿本，亦即朱郑卿所说的“朱墨斑斓，赤炼蛇、火枣儿糕更番迭出”的部分。我以后一种字迹与《昭代名人尺牍》卷十万斯同致其学友董巽子信的刻帖以及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的万氏给董巽子另一封亲笔手札对照，请笔迹专家以及著名书法家孟海先生鉴定，认为笔迹一致。沙孟海先生因而作《万季野明史稿题记》一文，文中说：“学人书迹，淳朴古拙，不尽合书家机杼，亦不避简俗体。本稿有张闻声先生宗祥《跋》，说‘万氏早期字学黄石斋’。余所见明清之际学人笔迹，黄石斋、顾亭林、万季野皆以拙胜，但气味各有不同。万书构法，多上大下小，如其‘兵’、‘共’、‘昇’、‘巽’等字，寻常下部横画特长，彼则下部简缩，非他人所及，连万氏诸兄斯选、斯大、斯备都不如是作。今日可以确定，《史稿》、手札、刻帖三者同出一人之手，而《史稿》两处无名款之签记，皆真实可信，惜不能起柳先生于九原而质证之。”（《宁波大学学报》1990，1）。除上述所说外，《史稿》与手札、刻帖某些字的书法亦一致，显然为一人所写。不过《史稿》笔迹比较苍老，后者较圆润，前者似为晚年所写，后者为早期所书。合以沙孟海所考，从笔迹上看，这一部分史稿当为万斯同亲笔无疑。天一阁所藏这类史稿共六册，如以第一篇列传人名记，这六册为《汪应蛟》、《高耀》、《王士性》、《邹素学》、《孙一元》、《毛志》等各卷。

另一类正楷誉写本亦六册，除书有“徐潮具稿”的《孙玺》卷外，其他五册为《魏时亮》、《宋钦》、《朱燮元》、《朱方年》、《王宽》等卷，这六册都有用朱笔、墨笔或白粉笔增损的字迹，而这

些字迹与前一类字迹完全一致，肯定为万斯同手迹。由此可得出结论，这些钞本经过万氏的笔削。在徐潮具稿的《孙玺》卷中，每传题目下面也都有万氏所写“徐潮”两字。然而其中《戎良翰》传下的徐潮两字，却又被涂去。柳诒征先生说的批者与撰者为两人语气的《陈琳》、《周世选》、《王廷瞻》三传，也都属这一种，所批的字正是万斯同的手迹。

《史稿》中也有重复的传，如《李耘》及其所附《史永安》、《刘锡玄》传，《史徽价》及其所附《闵洪学》传，既在万氏手迹的《汪应蛟》卷中，又见于正楷誊写的《朱燮元》卷中，这种情况共有十三人，说明誊写者据万氏手稿予以抄录。因此在《汪应蛟》卷前面所题的：“此乃从稿本中誊清者，吾父又仔细看过，抄时当以稿本编次为据，……”等一行字，看来并非伪造，所以朱懔卿没有把它去掉。除“徐潮具稿”这卷外，不能排除为万斯同子万世标所抄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天一阁所藏这十二册《明史稿》，其中六册为万斯同独力所撰的手稿本，其他六册或为他人所撰，或为万氏所撰经过誊清的本子，但这六册又都经过万氏的修改。

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避讳法来考证，如《李耘》传所附《刘锡玄》传，“玄”字并没有避康熙帝玄烨的讳，这在史馆的诸纂修官中都不可能，因为他们都是清廷命官。只有万斯同以布衣参史局，不食清廷之禄，而又胸怀民族意识的，才有可能。其子万世标在《明史稿流散目录》中说的：“不涉忌讳者又仍先君原本”，这当可用来作审定此稿是否为万氏原稿的一种重要方法。

再次，此稿《王铁附钱泮》传中对倭寇多称为“贼”，如“忿贼燕其父柩”、“贼突入他山港”及“时贼掠旁县”等等，后来王鸿绪《横云山人明史稿》把“贼”字一律改为“倭”字，张廷玉的《明史》因之。把明时的“倭寇”称为“贼”，正是万斯同高祖万表的观点。万表是嘉靖间早期抗倭名将，他把倭寇称为“海寇”或“贼”。如在《答张丰洲总制书》中说：“又见近贼多昆山、太仓、崇明人”（《玩鹿亭稿》卷四），“盖以倭为名，正以自蔽”（同上），“今此贼屠城掠邑，杀官戕吏，……而犹混言‘倭寇’，不实上闻，果何待耶？既曰‘倭奴’，酋长为谁，是谁欺乎？”（同上书卷五《海寇议》）他指出倭既多为中国人，所以不能称“倭”，应称为“贼”。此稿《王铁传》采纳万表的观点，是证实此稿为万斯同所作的又一有力证据。

最后，柳诒征先生引用翁方纲的诗后说：“‘体例依然无论赞’，盖万书无论赞，王稿亦无论赞”，而天一阁藏此稿有论赞，柳氏从而得出此稿非万氏作的结论。这一说法，颇值得商榷。所谓“体例”，是万斯同卒后王鸿绪定的，王氏在《史例议》中说：“窃思篇中所述，贤否已是昭然，……昔人谓赞语之作，多纪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惟加文饰而已。”因此他提出明史的列传，应如《元史》那样，去掉论赞（见《明史例案》卷二《王横云史例议上》），所以王鸿绪的《明史稿》无论赞，张廷玉《明史》步其后尘。然而，今藏北京图书馆的《明史》四百十六卷和《明史纪传》三百十三卷两种抄本，其中有论赞，说明经王鸿绪手后，这些论赞全部被他砍了。由此可知，“万书无论赞”的前提是错的，据此而推论此稿非万斯同手稿的结论，就不能令人信服了。

总之，从上述四点来看，如没有强有力的反证，天一阁藏《明史稿》为万斯同手稿和修改稿，基本上可以肯定了。

万斯同《明史稿》与明史诸本的比较

以天一阁藏的万稿与王鸿绪的《明史稿》、张廷玉的《明史》相比较，来分析明史的成书由

主编手定稿、经私人刊本，到官方刊本发展过程中的诸种变化，是很有意义的，其变化可以分为四类。

一，万斯同对作者原稿的增损。

以“徐潮具稿”一册为例，此册《汪一中》、《王铁附钱泮》、《钱淳》、《孙瑾》、《陈闻诗》、《赵恺》、《姚长子》、《向孔洙》诸传都有万斯同的朱笔、墨笔修改处。如对《王铁附钱泮》传，增损就很多，徐稿的“王铁，号苍野，字德威，左卫人。生之日父母俱梦铁星落苍野中，因以为名，少倜傥，善骑射。”这一句，万氏只留下“王铁，号苍野，字德威”八字。又如，徐稿有这样一段：“五月，倭犯苏州，南京都督周子德战败，镇抚孙宪臣被杀。倭分兵掠浒关税，取道尚湖，经尚塘入海。泮为铁画策曰：‘贼来送死矣。贼利野战，今舍陆而水，又重载，我以师薄之，必大胜，不能歼，则继之以火，此天亡之日也。’乃率众急蹶倭湖上，穷追至尚塘。倭匿其精粹，使一二酋挑战，而四面伏起。泮陷伏中，被数枪，手刃二贼，与苍头严肃、赵秀俱死。铁奋身陷泥淖中，贼攒刃之，瞋目大骂而死，诸耆老皆死。”这一大段，全为万斯同抹去，而改为：“及时，贼掠旁县，将由尚湖还海。铁愤曰：‘贼敢涉吾地耶？吾不能坐令得志去，必击杀之。’力从臾，乃召诸耆长善率所部，扬小艇数十追贼。贼侦官军入隘中，出不意，两岸夹击。时独耆长数人从铁前，诸健儿皆在后，数人者力斗死。铁陷淖中，不得出，怒发上指，瞋目大呼，而贼刃已刺腹中，遂死。泮亦力战，身被数枪犹手刃三贼，与铁俱死。”

徐潮稿突出了钱泮，但钱泮不过是王铁的附传，这样写成了反客为主。万斯同的修改，除事实稍作改动外，主要突出了王铁，这是正确的。

二，王稿对万稿有重大删节的。

也以《王铁附钱泮》传中经万斯同修改后的“及时，贼掠旁县，……与铁俱死”这段为例，王稿删节为：“及倭掠旁县，方舟由尚湖还海。铁愤曰：‘贼尚敢涉吾地耶！必击杀之。’泮亦力从臾，乃用小艇数十蹶倭，倭夹击之隘中，独耆长数人从，皆力斗死。铁陷淖，瞋目大呼，腹中刃死，泮被数枪，杀三贼而死”（《明史稿》列传第166《忠义二》）。又如，万斯同保留徐稿的句子：“县故无城，铁议城之。甫兴役，贼突入他山港，且来犯，人情汹惧。铁誓以死御，会庄八溥苍头遇贼，杀三人，贼惊恐。而铁乃躬自课役，三月而城成。三十四年四月，贼来薄城，矢石交下，贼引却，遽去。”这一段，王稿删成：“县故无城，铁率士卒城之。倭来薄，数御却之”十七字。王稿删改的目的，是使文句简要。

三，万、王、张三稿变化不大的。

如万稿《郑和》传，王稿较万稿稍略，而《明史》与王稿基本一致，而更简略。万、王两稿主要区别：一为王稿因统一体例而有所修改，如万稿在一开始以“帝”称明成祖，后面又称“天子”，王稿一律改为“帝”；二为王稿对万稿个别字句予以删节，万稿有：“和有智略，知兵习战，帝甚倚信之。当是时，帝以兵戈取天下，心疑建文帝行遁海外，将踪迹之”句，王稿改为：“有智略，知兵习战。帝疑建文帝遁海外，欲踪迹之”，使文句更为简要。三为把万稿整段削去。如万稿“不服则耀武以蹶之”句后，有下面一段：“诸邦惮其兵威，且贪中国财物，莫不稽颡称臣，厚礼使者。自是蛮邦绝域，前代所不宾者，亦皆奉表献琛，接踵中国，或躬率妻孥，梯航万里，面谒阙廷。殊方珍异之宝：麒麟、狮、犀、天马、神鹿、白象、火鸡诸（后原有一“异”字，万氏复涂去）奇畜，咸充廷实。天子顾而乐之，益泛海通使不绝，中国物力亦为之耗焉。”（《明史稿》列传第178《宦官上》）这一大段，王稿全无。又如万稿“所至颂中华正朔（原为“观览其山川，采其风物”句，后抹去，改为此句），宣扬文教（“文教”前原有“中国”两字，亦为万氏抹去），俾

天子声灵，达于天外”句，王氏亦删去。

四、万、王稿和《明史》去取分合不同。

王鸿绪在《史例议》中说：“史馆原稿立传过多，今删其十之四，然犹未免于瓜分豆剖也。传多则事必重见，重见则文不警策。……今若合《纪》、《志》修订，将列传之可削者削之，可并者并之，庶不致苦《宋史》之烦而难阅，复益之以《明史》也。”（《王横云史例议上》）他所说的“史馆原稿”，指经万斯同增损后的原稿。

因而，把万稿与王稿以及张廷玉《明史》对照，分合去取很不相同。万稿有而王、张皆无的列传约有二十九篇，即《孟北》、《章时鸾》、《刘应麒》、《廖谟》、《张岩》、《姚堂》、《饶秉鉴》、《周旭鉴》、《吴孟休》、《周懋》、《张士美》、《邹素学》、《邢简》、《玉衡》、《张诗》、《吴纶》、《方太古》、《赵元铅》、《王廷辅》、《宗珏》、《叶七》、《唐孟元》、《林享》、《魏镜》、《姚长子》、《金养》、《毛志》、《徐晞》、《陈嘉猷》等。

万、王两稿有而《明史》无的，有二十八篇左右，即《高耀》、《于大节》、《刘聚》、《沈宠》、《梅守德》、《王之垣》、《赵贤》、《徐学谟》、《宋钦》、《丘陵》、《于士廉》、《马昂》、《胡直》、《周孔教》、《王继光》、《张尺》、《史鉴》、《刘英》、《郎瑛》、《何孟春》、《王德明》、《王永光》、《戎良翰》、《向孔洙》、《王坦》、《杨瓌》、《张谦》、《项乔》等。

如《王永光》传，万、王皆有，而《明史》独无。张廷玉把其事迹分散见于第十一以及自二十至二十六各卷，共四十余处。王永光为启祯间大臣，其人事关党案，如此重要人物，《明史》竟不列传，实在奇怪。王永光其人在诸本归属种类的演变，亦值得注意。万稿把王永光与东林党人曹于忬同列一卷，意在明当时党争的一般。王稿则把他与获罪免职或被处决的毕自严、王洽、梁廷栋、陈新甲以及声誉不佳的冯元飏兄弟、张捷辈列在一起，已降了一级。张廷玉则不但列正传，连附传亦无，更贬之又贬了。由诸本列传分合异同，可窥知撰写编辑者对明史的观点和史实的差异。

又如，万稿有《陈嘉猷》传，王、张两稿皆不列传，只载他出使满刺加遇风暴事于《满刺加》传中。为什么王、张不予立传？柳诒征说得好：“如《陈嘉猷》传，载天顺三年朝鲜国王李瑋与建州董山嬖，私授以官，将为边患，嘉猷往责之一事。两书（指王稿和《明史》）均不明载，仅于《朝鲜》传中述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语。不知此建州三卫之都督为何人？赖此稿存在，始可知其因系董山而讳之也。”（《明史稿校录》）。

原来王鸿绪与张廷玉因避忌讳而撤去了陈嘉猷的传，从这里也可看出万斯同的民族意识以及天一阁藏《明史稿》为万稿之真，而王鸿绪之删史馆原稿，恐非仅仅为了使文句“警策”而已。

据朱郑卿统计，万斯同的这部《明史稿》，“凡文二百四十有八篇，中有二、三人合传者得二百五十有二人，益以附传一百三十有四人，都三百八十有六人。”而这三百八十六人中，我仅抄录了四人，因而远未能对此稿作较深入的研究，以窥万氏史学思想的底蕴。我急切希冀出版此书，不但对保存这一宝贵的史籍和研究明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可以对清浙东史学的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并推进到一个新的台阶。